

么书仪著

元代女人心態

文化艺术出版社

07

元代文人心态

么书仪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无代文人心态

么书仪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9.875字数228.000插页2

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039-1200-6/Z·35

定 价：6.50元

序

邓绍基

么书仪同志多年来研究元人杂剧，卓有成就。我早知道她在研究杂剧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关于元代文化背景的材料和见解，酝酿着写一本书。果然，她在参加编写《元代文学史》的工作结束以后，应文化艺术出版社之约，决定撰写《元代文人心态》，为此又进一步读了大量史籍、笔记和别集。在与我交谈中，我感觉到她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但写作过程却也不是那么顺利，似乎是书的体例、框架问题在困扰着她，有过反复，出版社的同志也同她交换过意见，她作了认真的研究，斟酌再三，终于成书。交稿后，未及等到付印，她即东渡日本。去国前夕，她来寒舍告别，并嘱我写序。去年岁末，她从东京来信，信中说：

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和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元代文人面对蒙古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问题也更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也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选择的人物有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頫、刘因、戴表元、顾阿瑛、杨维禎和危素等，一是考虑他们较“知名”，也较“典型”，二是相对说来他们有较多资料可稽，三是他们处于从元初到元末的各个时期，也照顾到

出身、经历的不同。本来想分问题来写，但后这一来打算没能实现，最后还是采取以人物的经历为线索的边叙边议的写法，有点像评传了。好处是人物的面貌、经历比较清晰，缺点是章节之间讲到的问题、论点就不免有交叉重复。另外，从我现在感觉到的是，有的问题本来可以更深入展开，但当时限于理论水平和思考深度，未能做到。

这番话语，既说明了写作意旨，也说到写作甘苦，真所谓“得失寸心知”了。

从书仪同志这本书，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谈论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总是比较强调民族矛盾和“九儒十丐”这类问题。但当这类历史事实和稗史记载被当作一个无所不纳的框架，或者由此形成为一种套说的时候，反而会导致种种失去历史真实性的误说。五十年代初，有的同志企图普遍地从元杂剧中找民族矛盾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流于机械，早被扬弃，不料到了七十年代末，还有人顽强地坚持从社会“主要矛盾”观念出发，认为只要是对元代黑暗政治作批判和抨击的作家、作品，也必然是针对着“异族统治”的。这其实就是只从一般的社会情况出发的套说。我想，这不只是通常所说的有关思想方法或研究方法的争议，实也涉及是否承认和尊重历史实际的复杂多样。

是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总是呈现出这样那样的矛盾状态，他（它）们并不表现为一个套式。曾经追随文天祥在闽中坚持抗元斗争的赵文，失败后遁归江西故里，后来当学官，有人说他被迫仕元。同样也曾追随文天祥，并且捐家产以助军饷的王炎午，在文天祥被俘后，作《生祭文丞相文》，期望文天祥速死以成大节，文天祥死后，他又作《望祭文丞相文》，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王炎午并未被迫仕元，他好端端地隐居在江西，但在他的垂老之年，却在《上贯学士书》中尊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为

“开国元勋”，阿里海涯正是在灭宋战争中有赫赫战功的人物。对赵文和王炎午身上存在的这种“矛盾”现象，特别是对王炎午的前后不一，前人尝有评论，或谴责或惋惜，大抵是从政治态度着眼。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传统心理着眼来作探讨，或许更多有可评可说之处。

《元代文学史》定稿的时候，我深感诸多问题需要再深入研究。现在读了书仪同志这本书，我觉得其中论述和所提供的资料对我在思考这类问题时很有帮助。我相信它也会引起关心这一研究课题的同行们的注意。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

几点说明

多年以来，我主要从事元代戏曲的研究。在涉及元代诗文作家的著作、笔记以及史料的时候，深感元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时代。在这一特定时空下生活的元代作家（扩展来说是“文人”）除了也面临着与其他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相似的矛盾外，还经受与另外时期不同的矛盾，因而形成了他们之间某些具有倾向性特点的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的形态。

《元代文人心态》一书，就是对处于这一特殊年代的某些文人的际遇、思想、心态的描述。我的描述，在范围上不能说是很全面，我只是选择他们之中若干有代表性人物的状况加以考察。另外，对于描述对象的关注点，也作了一些限定，即主要了解他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遇到的基本矛盾，尤其是文人与政治，与儒家传统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在面对思想危机时所作出的对策和反应。

这里所说的“元代”，首先当然是指忽必烈建立元朝到元朝灭亡一百多年的这段时间，以及元朝治下的区域，但也还包括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时期和宋、辽、夏、金、元易代之际更广阔的时空。

至于“文人”这一概念，由于对它应该有着更为复杂的理解而需要作些必要的说明。书中使用的“文人”，包括“文士”、“儒生”、“儒士”乃至“知识分子”的说法，都不是在严格意义上的使用。不过，我在讲元代的“文人”时，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第一，它指的是“读书人”，也即具有专门的“知识”，并

且以某种知识技能作为自己的专业和谋生手段的人。第二，这些人还应该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关怀着社会理想、以及自身基本价值的实现。这两条，缩小了我们通常称之为“文人”的范围，我对评述对象的选择，也主要在这一限定之下进行。从后面这一含义上看，这里的“文人”，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有着某些共同点。按照现代西方学术界的看法，“知识分子”主要不是指有一定知识，并以某种知识技能谋生的那部分人。他们倾向于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定义“知识分子”，认为只有那些超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富于使命感，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企图以自己的思想、人格给社会以影响、启示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即使那些怀有拯物济世志向的人，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某一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因此，把他们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太确切。然而，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一再标榜他们对于“道”、“义”的信仰和为其实现而奋斗、殉身的志向，这其实也构成中国“文人”思想性格的一大主要特质。从这样的内涵看，这里所谓的“文人”与现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特征有相类之处，但是，这二者又不可能完全相同。本书具体行文中用到的“文人”、“文士”、“儒生”、“儒士”、“知识分子”等说法，应该被看作是能互相取代的。当然，这些人既然被称为“儒”生，那么，指的也只能是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思想核心的那部分人了。他们在本书涉及的文人中，占了绝大多数。

近些年来，“心态”是个很流行的词儿，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想，个人的行为是由主体条件与环境情势的复杂关系所决定，“文人”的行为、语言及写下的文字，都表现了一定的情感因素和心理状态。我这里所说的“心态”，便是考

察种种外显现象背后的“欲望”的复杂、矛盾状态。当然，基于上面已讲到的对本书论题的限定，这种欲望、心理，更多地侧重于“社会心理”方面。

在这本书里，我选择作为主要评述对象的人物有：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许衡、郝经、刘因、赵孟頫、戴表元、顾阿瑛、危素、杨维禎以及从事杂剧创作的一些书会才人们。确定以他们为描述对象的理由，一是根据前面对“文人”的范围的理解，二是他们在其所处的时代曾有一定的影响和代表性，三是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态所呈现的多样性。自然，他们的思想、行为有文字材料可资查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目 录

- 序邓绍基 (1)
- 几点说明.....(1)
- 一、背景分析之一：宋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
状况及造成的影响.....(1)
- 二、背景分析之二：元代文人思想意识的传统
构成及危机.....(7)
- 三、驾驭时代的梦幻和建功立业的急迫.....(13)
1. 动乱年代的选择(13)
2. 别有人间行路难(25)
——耶律楚材心力交瘁的一生
- 四、社会道德和历史责任感的实现.....(71)
1. “纯文人”从政的悲剧(71)
——元好问参政始末
2. “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101)
——谢枋得于名节生死之间
- 五、用世、弃世与玩世.....(122)
1. 忽必烈初期的社会氛围(122)
2. 金莲川谋士们的命运(137)
——许衡及窦默和姚枢
3. “先天下之忧”与“全一己之愚”(145)
——苏武式的使节郝经

4. 维护“本实”的退避(156)
 ——刘因的操守
5. 失去了庄严感之后(167)
 ——飘浮在社会下层的吏和书会才人们
- 六、寻找新的精神归宿.....(182)**
1. 在治国问题上两种文化的冲突(182)
2. 于通达中寻求平衡(195)
 ——赵孟頫的从政态度
3. 半隐半俗、亦隐亦俗(222)
 ——戴表元新的生活理想
- 七、心理的变态.....(243)**
1. 失去权威的时代(243)
2. “世纪末”的事乐主义(250)
 ——玉山草堂文人的狂饮
3. 奔竞于“仕宦之途”者的悲哀(267)
 ——危素的“失身瓦裂”
4. “补天”无术者的沉落(280)
 ——杨维桢多变的生活道路

一、背景分析之一：宋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及造成的影响

了解宋、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背景，对于考察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元代文人心态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在本书的具体章节中，结合所评述的具体人物，对相关社会背景材料，都作了比较详细、充分的介绍，尤其是对忽必烈以降的元代政治、宗教、风俗、社会思潮状况多有涉及，但对元代文人思想性格产生重要影响的宋、金社会政治状况，仍需作些必要的说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或宋元之交的文人是直接生活在一个长期战乱的年代里，或者他们的生活为长期战乱的巨大阴影所笼罩。元代以前的宋、辽、夏、金长期对峙、战事不绝，几成五代十国动乱时代的继续。

在大唐气数已尽，五代十国彼此之间征伐无定，互相消耗了近六十年之后，后周的禁卫军出身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攫取了皇位，建立了大宋。当时，普遍认为天下分久必合的时候已经到来。公元960年，宋太祖登基时，宋的“夷敌”只有契丹一家。宋太祖和宋太宗于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979年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中“十国”的历史。然而，对于已经占据了燕云十六州的辽国，却始终无力收拾，只好与契丹人时战时和、长久对抗。

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以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辽承天后为叔母、约定双方各守现存边界的沉重代价，换取了媾和之约——“澶渊之盟”。与此同时，出没于夏州、银

州的党项族也逐渐强大，于1038年建立了夏国（史称西夏），成为宋朝又一个劲敌。在1044年，宋仁宗又答应每年“赐”给夏国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且在各个节日和夏国国主的生日，还要加“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着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即使如此，宋与辽、宋与夏边界上的战事还是不时发生。这就是宋、辽、夏三国鼎立时期。

北宋末，崛起于黑龙江畔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金在阿骨打的率领下，迅速地灭辽，并将西夏收为附庸，宋朝不得不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从此，不断地向女真人割地赔款、忍辱称侄、派亲王为人质，以至于徽、钦二帝被掠走，金的南部边界一直推到淮水和秦岭一带。南宋迁都到杭州，继续与金长久对峙，又是不断地纳币、求和，以期苟且偷生。

南北宋的统治，延续了三百年，史称“大宋”，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天下。开国时平西蜀、平南唐、平南汉、平北汉尚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之后对于辽、夏、金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终两宋之世，几乎竟可以称是五代十国以来乱离时代的延续。

宋、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上述的长期战乱，又主要表现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从另一角度影响了文人的社会心理。

胡汉之间实力的消长，是决定民族自信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点上，两宋君臣、文人乃至百姓，在情感上、心理上，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宋太祖取周自代之后，自是雄心勃勃有一统江山之志。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君臣对边务的考虑，便已经是立足于“守”了。如咸平初，知代州柳开上言中云：

又西鄙今虽归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须得人制

御，若以契丹比议，为患更深……今甲兵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内中已经包含了对于西夏、辽朝外患难除的深深的忧虑。

二帝北狩，两河中原陷落，帝都南迁后，宋高宗虽无收复之心，臣民却多有北伐之志。建炎三年（1129）起居郎胡寅在高宗幸金陵诏议移蹕之所时，即上疏直接指责宋高宗：

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宋史·儒林传》

韩世忠也直言：

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宋史·韩世忠传》

这些都表现了一种奋发的民气和民心。之后的张浚为了中兴大计而经略关陕；吴玠、吴玠兄弟拒金保蜀；岳飞志在进取中原操练兵马；刘锜大败金人于颍昌，都是有志之士为恢复国土所作的努力。他们给文人如陆游者，带来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这样的希望。然而，张浚不久被召回并解职归里，吴玠奉诏班师之后，“金人乘其后，玠军亡失者

三万三千，部将数十人连营痛哭，声振原野。于是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皆复为金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到岳飞死于秦桧之手，北伐事从此中止，都源自南宋朝廷自身的内耗。

此后每下愈况，到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宋遣使求和，又割海、泗、唐、邓及商、秦诸州给金朝，每年纳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此换来约三十年的“太平”。宁宗时，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再次向金求降……南宋君臣从此不敢再有北伐恢复的念头了。到南宋末，宋度宗咸淳年间，有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书贾似道：

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势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月，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怒。欲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冲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从汉族人儒家传统的观念出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夷臣服，称臣进贡才是理所当然。而像两宋这样，战则败北，和则纳币，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在汉族文人看来，丧师失地、割地赔款，特别是俯首称“侄”，简直是屈辱之至，这一切无疑在上至帝王、下到百姓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抹不掉的耻辱的烙印。如宋高宗建炎三年，赵构有诏曰：

国家近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軫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

旬，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在中国历代帝王的诏书中，赵构的这一纸晓谕天下的自白，也可以称是惨痛之最了。言词之中，颇有不堪卑屈积久，声泪俱下之意。也许，应当把这诏书不仅看作是赵构一人的感受，而是长期屈辱而自尊心剥蚀几乎殆尽的那些汉族文人的哀鸣！

宁宗之后，朝野上下已将苟安视为常情，不甘受辱的报怨、复仇之辞，已经引不起太多汉族文人的兴趣了。

金兴起于北宋末，灭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几乎与南宋相始终，历时一百五十年。女真人开始以锐不可当之势灭了辽国，降服西夏，并吞并了宋朝国土之半。然而金章宗后，便开始进入衰落，逐渐也对蒙古人求和、纳贡，直到迁都南逃。金朝世宗、章宗时代虽然号称“治世”，但由于金自开国以来，先加兵于宋，后应付蒙古，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连年用兵导致内忧外患，所以也很难说有什么“太平盛世”。南渡之后，金朝人心涣散，宰执“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且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刘祁《归潜志》），见识短浅、推诿责任、委靡苟容、安卑习陋成为一时的风气，这种风气浸染所及，包括了女真人和汉族人。

包括由宋入元和由金入元的元初文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长期动乱的社会之中，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亲历过战祸和颠簸，即使并未亲身经历离乱之苦，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为这一特定的社会氛围所制约。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心理常态

与变态，都难以摆脱这一社会情状的拘囿。在这些心灵敏感的文人中，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某种带有共同性的倾向：

一是两宋和金都逐渐失去了权威，失去了号召力。士人普遍对汉族政权宋和女真政权金都感到失望，愿意相信宋、金气数已尽的舆论，两宋苦心经营的理学的拘束、统驭的力量，也显然地受到损害。许多人都在关注着“王气”现于何方？谁将是奉天承运的新的天下之主？至于这新的君主是汉人还是夷狄，倒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二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君临中原以后，事实上在汉族人中（特别是在由金入元的士人中）民族情绪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激烈和普遍，这可能与久经兵燹之后滋生的对于太平盛世、大一统的急切的、强烈的向往和对有能力收拾残局的蒙古君主的可能带有若干盲目性的信任有关。

三是战乱使人产生了与太平时期不同的对于生命的体验。因而导致了对于功名利禄的新的认识，对于亦隐亦俗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对于耳目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狂热追求。

四是元朝统治者与文人之间产生的轩輊，大多未超出传统的君臣矛盾的范围。即使有时候有些矛盾的实质，反映了胡汉之间文化的冲突，但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化作了对于具体政策的意见分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汉族文人的心理上，没有民族压迫的阴影，只是这一点不被经常强调。

五是由于元朝八十年不开科举，使当时那些接受了儒家思想传统，并怀有拯物济世理想的文人的心灵受到伤害。生计问题造成的人心散乱，不思进取造成士人品格的丧失，怀旧情绪造成的对汉、唐盛世不切实际的旧梦重温，地位改变迫使文人对生活多角度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突破，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使元代文人的心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